

美日关系的文化地政学

——读《亲美与反美》

俞佳儒

评论书目：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岩波新書、2007 年。

反美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9·11”事件可以说是 21 世纪反美主义最惊人的一次行动。然而，在这样一个日趋反美的世界中，日本却保有着一种异样的亲美意识。虽然 1960 年左右的反安保斗争中，日本社会呈现出了明显的反美意识，但亲美依旧是一种主流的倾向。

在这种“亲美”与“反美”的表象背后，是深深隐藏在日本人日常意识中的美国意识。“在产生‘亲美’与‘反美’这种解释的文本化实践中，在不能通过二元对立的图式来解释的连锁与冲突中，在不同层面的文本切磋琢磨的半无意识实践中，近现代日本人是怎样与‘亲美’乃至‘反美’这些表象相衔接的？”^①简单来说，对于战后日本社会而言，“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在日本人意识的塑造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为何“美国”在塑造日本人的意识时不显山不露水，以至于成为了日本人的“政治无意识”？这就是社会学者吉见俊哉教授在《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中展现出的问题意识。

在这样的意识下，吉见采用的视角并非狭义政治学的，而是文化政治学的。^②《亲美与反美》中展现的并不是报纸“国际版”和“政治版”所呈现的美日关系，而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美日关系。这种美日关系的最大特点是“体验性”，所以对于身处中国的我们来说并不能直接感受到其存在。特别是对于学习国际关系的学生而言，其视角往往会被大政治、大战略遮蔽。因此《亲美与反美》所呈现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美日关系就显得更为珍贵。

一、近代性：从“自由圣地”到“鬼畜英美”

^① 吉見俊哉『親米と反米——戦後日本の政治的無意識』岩波新書、2007 年、26 頁。以下引用本书仅在文中表明页码。引用部分主要依据王广涛老师尚未出版的译本，并由笔者做了部分修改与调整。

^② 吉見俊哉「「アメリカ」を語る」『アメリカ研究』39 号、2005 年、86 頁。

第一章“作为近代性的美国”主要考察了战败前日本对美国观。吉见把漂流记、文学作品、流行文化等作为考察的文本，构建起了战后日本美国观的“前史”（pre-history）。

日本对美国观当然是从与美国的接触开始的。而日美之间的直接接触事实上开始于被美国人搭救的日本漂流民。漂流民回国后记录了与美国人的交流，形成了“漂流记”，其中就记录了美国的风土人情（pp.28-30）。

佩里来航之后，美国正式进入日本人的生活。佩里肖像于日本民间的流行，其实“早于明治天皇、西乡隆盛以及明治政府的元老，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大众媒介中第一位被直观视觉化的公众人物。”（p.31）可见“美国”在日本认识近代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早期日本对西洋的理解，不仅有荷兰的影响（兰学），其实更多的还是美国的影响。

面对“美国”的到来，倒幕志士和思想家们则受到美国“自由”观念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美国”就是建设自由国家的榜样（p.32）。其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福泽谕吉。福泽眼中的美国已经形成了理想中的自由政治。通过福泽谕吉在教育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这种“美国”形象也刻印在了当时日本人的认识框架中（p.33）。

不过，随着更多人前往美国，日本也出现了更加多样的美国认识。吉见考察了内村鉴三、永井荷风、有岛武郎的美国体验和美国观。相比于早期福泽谕吉将美国作为自由圣地而理想化，这些人的美国观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结构。内村基于自己的经验，将美国区分为了“理想中的美国”和“现实中的美国”，指出了现实中的美国的种种不堪，并批评了现实美国与理想美国之间的差距。^①而到了有岛的《一个女人》这里，美国则成为了一个“异托邦”（heterotopy）：美国不是可以安放她自身的空间（pp.38-40）。不过，有岛的认同最终也没有回到日本，而是像小说的场景一样，漂在了太平洋的公海之上。在笔者看来，既然是“异托邦”，有岛似乎也就没有区分“理想—现实”的必要了。因为这种区分在内村那里寄托了某种向往（至少是对理想美国的），而在有岛这里，向往是无处寄托的。

进入大正时期，威尔逊主义在日本广泛传播。不过，这时美国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而是渗透进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① 区分理想与现实似乎是内村看待世界的一种常见范式，内村的日本观中也区分了作为现实的日本和作为理想的日本。这种“理想—现实”的观察视角或许与内村的基督教背景有关。

在大众文化领域，吉见考察了浅草歌剧院的兴起。虽然名为歌剧院，但传统的欧洲歌剧在日本、在浅草遭遇了大溃败，真正流行起来的是美式通俗喜剧。而在日常消费领域，1920 年代起美国商品在日本人中极为流行，美式生活风靡各大都市，街上的摩登女郎几乎清一色美式装扮。“美国”已经不只是他者，而是日本的一部分（p.46）。

美国的影响并非单向的，它还是具有反作用的“他者”，日本社会通过建构与美国的关系培育自我认识。就是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日本人中逐渐出现了“回归日本”的动向，不过这种动向不过还是一种对“美国”的欲望，是将西洋视角内在化（p.53）。

或许正是因为上述“回归日本”并没有从本质上排除美国，所以直到日美开战时，“鬼畜英美”的口号背后依然存在着对美国的欲望。“日本人对美国关注的热情不减，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亚洲太平洋战争正酣之际，日本的大众表面上高呼‘鬼畜美英’，即使这一口号作为信念烂熟于心，但仍然能够强烈地意识到美国的存在，同时在无意识间继续推崇或向往美国。”（pp.54）从中可以看出日美间视角的不均等：战时美国不断把日本视作野蛮敌人，而日本却没有勇气把美国视作劣等国。

所以，美日之间的不均等不是从占领开始的，在战败以前，“美国”就已经深深嵌入日本人的日常意识中。吉见指出，对于近代日本民众而言，美国代表着近代性（modernity）本身，而这种近代性的风靡，恰恰是在日本国家权威动摇的时候（幕末维新和昭和初年）（p.58）。从政治的层面来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近代性学习自德国。从民众的日常意识来看，消费娱乐生活的近代性来自美国。“这种富含来自底层，且将个人欲望开放至本国的外部的近代，看似与以天皇为顶点的父权制近代呈对抗性关系，但实际上二者或许蕴含着某种互补关系。”（p.59）

从这一角度来看，美日“拥抱”的结构关系实际上早已埋藏在了日本人的意识之中。

二、身体与权力：麦帅、天皇和女郎

日本战败后，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麦克阿瑟。而对于日本民众而言，他们遇到的则是涌来的美国占领军和随处可见的美军基地。无论是政治空间

还是日常空间，“美国”似乎充斥着日本。但吉见指出，“美国”在更深入地嵌入日本的同时，似乎也有意地将自己隐去。

天无二日，但战后日本有麦克阿瑟和裕仁天皇。我们对这二人的认识基本都来自那张著名的合影。合影中天皇唯唯诺诺，而麦克阿瑟意气风发。

如果熟悉麦克阿瑟的话也会知道，麦帅有着强烈的表演型人格。但是在战后日本的公共空间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上述图景。通过吉见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日本民众能够意识到麦克阿瑟的压倒性存在，但麦克阿瑟更多地在隐藏自己（p.85）。尽管各项法令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发布，但报纸上的新闻仅仅是以“大头照+法令/讲话”的形式呈现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麦克阿瑟的身体并不为日本民众熟悉。

相反，通过巡幸全国（冲绳除外），天皇的身体反而更为民众所熟知。这应该是占领军的刻意安排，他们有意重塑天皇的形象，通过安排巡幸，由天皇的身体代替麦克阿瑟，“并将其作为战后新支配体制的关键角色予以重视”，所以“巡幸其实是日美双方预想一致的结果”（p.91）。“昭和天皇的地方巡幸不仅重现了明治天皇地方巡幸的盛况，同时与隐居幕后的麦克阿瑟一进一出、相得益彰，昭和天皇的形象得以确立。”（p.92）

麦克阿瑟和天皇二人身体上的关系体现了美日间的权力关系。美国的占领政策事实上并不希望过于突出的“美国”因素。因此，众人皆知的占领军审查的一大功能就是隐去占领军的形象，营造出日本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表象空间（p.84）。那么作为占领军的统帅，麦克阿瑟的身体也不能例外。

而在日常生活中，民众遭遇的是众多美军士兵、基地和占领军设施。这些基地和设施嵌在日本国土之上，首先影响周边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通过这些周边民众，将美式生活和文化传播至整个日本。

吉见对这种影响的讨论也是从身体关系开始的。战败后，日本官方开始筹划慰安设施，号召日本女性服务美军，并宣称这是为国效力。警视厅将这些公开招募的女性称为“特别挺身队员”。不过随着性病在美军士兵中的传播，官方慰安被禁止，这些女性被粗暴地赶出设施。这些被称作“潘潘女郎”的女性本就穷困，还失去了唯一收入来源，只好站街招揽生意。其实，她们身上呈现出明显的“美国主义”——摩登装扮和巧克力，她们能够获得紧俏物资。所以说，潘潘女郎们

在遭受性暴力的同时，无意间也成为战后日本物质第一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的先驱（p.107）。此外，潘潘女郎和美国大兵走在街头，刺痛了日本男性的自尊，从中又呈现出一副“国家被外国统治”的文化地缘政治图景。总之，潘潘女郎身上所带有的新时代“美国主义”严重威胁了日本男性的主体地位，同时又暗含着日本男人性无能的“隐喻”。因而，占领期结束，日本男性马上开始疯狂反扑，企图将女性重新纳入传统家庭秩序，重建男性的主体地位。

占领文学基调的变化也体现了上述转变。“在占领结束前的占领文学，其视角着眼于身边的女性遭到蛮横的美军士兵侵犯却无力相助的日本男性，大体上表现了一种阉割、无能的性隐喻”，而五十年代占领结束后，“牺牲者”被特殊化，“从日常世界的外部，特别是残暴的美军士兵这一他者视角来唤醒读者对其暴力的愤慨，这样就确立了日本男性的主体性地位”（p.112）。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男性通过把潘潘女郎划出正常日本人的范围外，将其作为蛮横无理的美国的象征，从而“选择性地将其想要的‘美国’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p.112）。

通过麦帅、天皇和潘潘女郎三种身体，吉见构建起了另一种看待美日关系的方式。“纵观整个占领期可以发现，麦克阿瑟作为占领者逐渐退居幕后，而天皇的身体则跃居前台，这里蕴含着天皇与占领者形象的换位以及二者之间潜在的‘拥抱’。”（p.113）而潘潘女郎的身体则明示着美军士兵才是这个国家的占领者。

这与殖民地民族主义建构国家身份的逻辑是相通的。男性主导的民族主义往往把女性作为国家纯洁性的象征，而不问女性自身的意愿。^①战后初期的日本女性，尤其是潘潘女郎，同样沦为一种象征，她们自身的主体性反而在日本男性建构日本主体性的过程中被消灭了。

通过身体描绘战后初期的美日关系图景，是《亲美与反美》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尝试。

三、日常生活中的美国主义

战后日本的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受到了美国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起初就是通过基地完成的。

日本民众生活在战后的废墟中，但继承了旧日军基地的美军却在基地中享乐，

^① 辛西娅·恩洛：《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8-89页。

这对于基地边的居民是极大的诱惑 (p.120)。美军有着自己的俱乐部 (club)，士兵们在俱乐部中过着美式的娱乐生活。这些俱乐部对于普通日本人是不开放的，仅有的能够进入美军俱乐部的日本人，是服务人员和演出人员。

在吉见的论述中，美军俱乐部的表演也体现着一种文化权力关系。首先，封闭的美军俱乐部本身就在日本的国土上创造出了两个空间，并通过进入限制来赋予美军士兵以特权，并通过允许服务人员和演出者进入俱乐部，在日本人中区分出了两个等级。其次，俱乐部中演奏的曲目完全由观众决定。美军士兵在异国他乡，并不希望听到异国情调的东方风情，而是希望享受美国本土流行的音乐。因此，所有演奏者必须对美式音乐进行模仿，才能在基地俱乐部中立足 (pp.122-123)。进入 60 年代后，美军基地在日本本土逐步减少，基地俱乐部被关停，原本在俱乐部中演出谋生的乐队及其经纪人就转入大众娱乐市场，将美军基地中的美国音乐带出了基地，风靡日本流行乐坛。而在冲绳，美军基地则依然在扩张，上述音乐权力图景虽然在日本本土减少了，但在冲绳得到了延续 (pp.123-125)。

不仅在基地周围，占领军设施周围也渗透出了美国文化。银座、六本木和原宿并不在基地周围，但也成为了引领潮流之地。这些地区采用英文路名^①，展现出摩登的风貌，大量日本青年纷纷模仿。在占领结束后，占领当局撤出这些设施，于是日本各地的潮流青年蜂拥而入，在这里创办时尚工作室，电台、电视台和广告工作室也纷纷在此开设，他们继承了美国的文化要素，并将这些文化要素通过媒体嵌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pp.125-135)。

在美国文化从基地和占领设施中渗透出来的同时，日本人也正在进行反基地斗争 (p.149)。无论是接受美国文化还是进行反基地斗争，这些都是与美国的直接遭遇和接触中进行的。然而，随着美军基地在日本本土的减少，美军带来的美国文化不再是日常可以接触的了 (p.150)。吉见敏锐地指出，这时日本内的“两种美国”开始割裂。一种“美国”是在慰安设施和基地周围形成的，不过随着占领军的撤离，其暴力色彩逐步减弱，并转为了在商业和文化上被消费的“美国”；另一种则是残留的基地边的“美国”，通过反基地斗争，渗透进基地周围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 (p.151)。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美国”的两面 (p.151)。前者直接来自于暴力性的美国，这不过在日本民众与美军的“脱离接触”中，被“提纯”

^① 这也是一幅典型的殖民地、租界图像。就如近代上海，租界中充斥着大量法文和英文路名。

为了消费主义的“美国”形象。在基地周边以外，美国暴力性的事实逐步被消费主义的景象吞噬（p.160）。

除了流行文化，家庭生活中也随处可见美国的身影。首先是住宅。美军和占领当局的大量涌来，同时带来了大量的家属，于是日本方面需要为家属准备住宅。这些住宅对标了当时美国中等以下的居住标准。但这给日本人带来了冲击：即便在美国人看来平平无奇，但这些家属住宅在日本已经是革命性的存在。与此同时，家具、家装和电器在日本批量生产，供应给占领军，于是彼时美国流行的现代主义风格开始塑造日本家装业和家电业的设计（pp.162-166）。当时流行的漫画作品和电视剧也帮助塑造了日本人的“美国家庭观”。在战后初期的日本人心中，美国家庭就是“富裕且民主”的象征（pp.167-172）。当时的美国家庭剧往往会在展现美好的美国家庭生活的同时，设定一个“恶势力”。日本观众向往美式生活，而反感这些恶势力，与冷战格局中日本站在美国一边是相互呼应的（p.173）。

电视机作为美式生活的凝结，也反映了美国在战后日本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存在感”。电视机在日本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在战后初期到五十年代前期，电视并没有走进日本的千家万户，更多地是设置在街头供行人收看的。这时的人气节目是“力道山”的摔跤表演。“力道山深谙电视镜头的奥义，所以他在比赛过程中融入了美式表演的色彩，以此来提高观赏性。同时，在他的比赛中往往呈现给观众的是，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对抗不断犯规的高大美国人的竞技场景。”（p.175）“力道山的摔跤呈现出战后日本对曾经的敌国、占领者同时也是保护者的美国，所持有的屈折、复杂的感情，而这种感情通过电视画面得以形象化地表现出来。”（p.175）有趣的是，力道山是朝鲜出身，日本观众在听到类似传闻后选择了忽视，继续将其作为“日本人的英雄”来看待。因此，这种摔跤比赛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一出表演，是“民族性的象征剧”（p.175）。

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增长，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日本人的家庭中。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就是 1959 年皇太子明仁与美智子的婚礼直播。以此为契机，大量日本家庭开始购置电视机、接入有线电视，民营电视台数量也迅速增加。在电视节目编成上，美剧也退出了黄金档，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家庭剧；摔跤节目也辉煌不再，电视观众更加青睐电视剧和演歌。以“反美”为底色的节目（如力道山的摔跤）也让位于演歌天后美空

云雀，后者的歌声试图重构日本的主体地位（p.183）。

电视节目的潮流变迁背后是观众的变迁。自电视机进入家庭，主要观众就转变为了被重新纳入传统家庭秩序的主妇。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家电广告中，家庭电气化就是美式生活的象征，而美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的，因此构建出“家庭电气化=民主化”的图示。而主妇作为家庭电器的主要使用者，也被纳入到了日本的主体性建构中（pp.192-195）。

进入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家庭装饰和家电设计都开始从“美国的”转向“和风的”，日本的民族性要素开始上升。日本本土的家电制造商也开始向国内宣传“日本制造”的高质量，向日本国内介绍自己的电器在海外收获了无数好评，但事实上日本制造在国际上依旧贴着“低质量”的标签。总之，表面上来看，在家庭生活上，日本构建起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但事实上，“在战后的日本家庭中，日本民族性主体的确立来自于对美国视角的观照，换言之，对美式生活的追求即意味着新国民国家的形成，所谓新的国民主体化与美国主义的关系正是通过在大众中广泛扩散而成立的。”“在占领期天皇与麦克阿瑟的‘拥抱’所折射出两帝国的协调性关系，在六十年代之前广泛地渗透进国民的日常意识，并得到了积极的支持。”（p.206）

从吉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美国”在战后日本不断地“背景化”，成为一种背后的因素，而不是日本民众日常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在这种过程中，前文提及的“两个美国”的分裂便在占领后的日本发生了。无论是何种“美国”，都在日本的主体性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四、日本中的“美国”：延续性与超越性

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日本的“亲美”很稳定这一问题。在吉见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亲美”始终躺在日本人的日常意识中，而“反美”则不断被特殊化，下降到边缘群体（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后）。

同时，吉见也强调了战前、战时日本和战后日本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在“帝国—殖民地”的结构中体现的。在战前和战时，日本企图在东亚地区构建其帝国，而日本本土是这一帝国毫无疑问的中心。然而战败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名义上是盟军），事实上沦为了美帝国下的殖民地。前文已有提及，美军基本继承

了旧日军的基地。基地周边民众其实已经习惯了基地的存在。而且，日本在美国构建的全球帝国秩序中还成为了东亚地区的“准中心”。美国在失去中国后，选择让日本承担起构筑东亚秩序的作用，日本事实上也成为了韩国、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引领者（p.19）。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战败前后日本都是东亚的“中心”。这种中心不是日本在东亚内部确立的，而是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由外部力量规定的。因此，日本自然会更加亲近美国，而对于亚洲各国（恰恰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缺乏认同。美国占领者似乎也有意让日本民众感受到“帝国”的延续性。前文所述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的一退一进，尤其是裕仁天皇的全国巡幸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民众的迎接、地方官员的安排和媒体的报道等，与战前战时其实没有什么差别（pp.91-96）。这就是吉见所说的，日本的后帝国属性（p.234）：在自身的帝国帝国瓦解后，成为美国全球帝国秩序中的“准中心”。本该作为殖民地民众的日本人，反而“拥抱”了美帝国。

其实拥抱从幕末就已经开始，日本民众和知识分子或许早已进入了美国的“文化帝国”。在笔者看来，这是传统权力意义上的“帝国—殖民地”结构以外的另一重“帝国—殖民地”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吉见不断讨论的文化地缘政治关系。

文化上的拥抱当然不仅限于表面的时尚、流行歌曲和居住方式，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拥抱：美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他者被日本拥抱的，它是作为一种“審級”（日语）而被拥抱的。美国规定了日本的“近代性”应该是怎样的。

吉见总结了近代化以来日本中的各种“美国”。其一是外在的“美国”。“概而言之，截至 1910 年代，‘美国’对于近代日本而言是处于外部的特别存在……从整体上看，美国直到大正初期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它更多只是一个隔海相望、处于外部的他者，即使作为社会发展的模型，却并未活跃在人们日常意识的深处。”（p.226）另一种是内在的“美国”。其中还可以分为作为内在暴力的“美国”和隐性视角的“美国”。前者通过美军基地和潘潘女郎而直接得以体现，同时也是左翼反美运动不断反对的那个“美国”。后者则是在日本民众与美军士兵直接接触减少后“提纯”出的自由、强大和消费主义的“美国”（pp.226-230）。

其实，无论是哪种“美国”，都扮演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審級”的角色，

换句话说,“美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种超然性的标准。吉见在序章中曾提出了“‘美国’作为審級”这一观点(p.16),但在后续的论述中没有直接体现,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在自身的阅读中获得这样的感受。对于日本来说,美国始终是方向,是欲望。^①这种欲望可能与美国本身的性质有关:美国是开放的,美国可以是世界,因此可以被外人所欲望。作为一种方向,外在的“美国”进入了日本的内部,而成为内在的“美国”。因此“亲美”几乎成为了日本主流的必然选择。

六、结语

吉见俊哉的《亲美与反美》超越单纯的文化史和政治史,描绘了一种文化政治力学关系,尤其是以身体和空间为对象,形成了“另一种日美关系史”(もう一つの日米関係史)。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亲美与反美》是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的,它将日美关系定性为“帝国—殖民地”结构,颇有后殖民批判的意味。它关注潘潘女郎,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也形成了呼应。从书中可以感受到吉见教授的关怀。

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殖民地”并不只有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美国殖民地的色彩。因而,《亲美与反美》一书所展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还可以用来进行东亚区域的整体研究,对这些“殖民地”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另一种美韩关系史”“另一种美台关系史”,甚至“另一种美国—东亚关系史”。在吉见「「アメリカ」を語ること」一文中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他提出战后东亚的去殖民化,在冷战背景下被美国的霸权体制回收,但展现了不同的“亲美”“反美”观念和现象。^②其中日本是特殊的,因为只有日本保持了稳定的“亲美”主流。《亲美与反美》一书可以看做「「アメリカ」を語ること」一文在日本语境下的具体化。我们其实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对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从而展现更加丰富的东亚国际关系史。

^① 三谷太一郎曾讨论过日本的近代化模型是欧洲。在这一问题上吉见或许有不同看法,明显的欧化或许只在“鹿鸣馆时代”而其他时期美国才是日本模仿的对象,正如银座从巴黎风情转向了美国现代风格。参见三谷太一郎『日本の近代とは何であったか——問題史的考察』岩波新書、2017年、第一章。

^② 吉見俊哉「「アメリカ」を語る」『アメリカ研究』39号、2005年、85-103頁。